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刍议

(2007-6-28 15:22:41)

作者：钱逊

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他特别强调，这“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非此即彼的两种主张的争论，究其认识上的根源，就在于没有认识这个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互相联结的道理，没有认识和研究传统文化的二重性。

从对传统文化二重性的认识出发，就可以懂得，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是二重性的，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相容相通的一面。对待传统文化不应全盘否定，也不应全盘肯定，而应该是抛弃其带有时代特殊性的成分，继承、发扬其普遍性的、有益的优秀成分。传统文化中的普遍性的和特殊性的这两个方面，不是传统文化的两个部份，而是互相联结的两种性质。普遍性的内容总是与时代性的要求联系在一起，存在于时代性的形态之中，通过其时代性的具体内容而表现。所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是简单地挑拣分类，而是要对传统进行分析，从其时代性的具体形态中，剥离出其具普遍性的成分，从而抛弃其形式，救出其内容。对传统中普遍性内容的继承也不是简单地拿来就用，还必须立足于现时代的需要，对它做出新的解释，赋予它新的时代内容。这是一个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批判、继承、创新、发展相统一的完整的过程。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推陈出新。只有经过这样的推陈出新的过程，才能使“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的要求得到落实。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互补性

以上是从理论上分析应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以下将进一步比较具体地考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二者的关系。

比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看到，二者之间存在着互补性。

首先，拿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学来说，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是两类不同的思想学说，它们的内容、特质，在总体上就存在着互补性。人类生活面对三方面问题：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和改造自然；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认识和改造社会；处理人自身安身立命的问题，认识和改善人生。相应的，人的认识领域也有三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关于人生的学问。三者缺一不可。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学说。恩格斯说，马克思一生的伟大贡献是两个：第一，“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即发现了唯物史观；第二，“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即发现了剩余价值，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这两大发现主要是回答第二方面的问题，是认识和改造社会的学问。儒学的核心则是“做人的道理”；虽然儒学也曾为统治者用作统治的工具，但它的根本精神是“以修身为本”，是回答第三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关于人生的学问。正是在这一点上，二者存在互补性。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实践中，曾经看到这种互补性，自觉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以指导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党的建设中，中国共产党继承发展传统人生学说，突出强调党员的思想修养。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刘少奇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强调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提出了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要求和方法；毛泽东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传承传统人生价值思想，教育党员和革命群众。这些成果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对党员及革命群众的教育起了极大的作用；几代共产党员和青年都受到教育，在这些著作影响下成长。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党和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都面临执政党地位的严峻考验，更需要发扬这一优秀传统，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党员的思想修养。不仅如此，党成为执政党以后，还担负着领导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为此迫切需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生学说。而这种新的人生学说的建立，只有在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人生学问的精华，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人生学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大课题。

从更广的背景上看，上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内容、特质上的不同，也反映着中西文化和哲学的重大区

别。

西方哲学关注的是世界究竟是什么。恩格斯曾经论及哲学的基本问题，他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

中国古代哲学关心的，则不在于世界究竟是什么，而在于人应该如何行动，诸如人应该如何生活？如何管理社会？如何对待社会、他人和自然？等等现实的人生问题。中国人关注的中心始终是人，探究对自然的认识也是为了回答人世的问题。荀子的话“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很清楚地反映出这个特点。正因为这样，天与人的关系问题——人事活动与天（外间世界）的关系怎样？天道运行的规律怎样，怎样从对天人关系和天道运行规律的认识中来探索人道——就成为最基本的问题。至于“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思维与存在谁是第一性的问题，先秦的一些思想家似乎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因而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也是模糊不清的，以致现在人们想要确定他们的思想究竟属于唯心论还是唯物论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从中西文化和哲学的这种不同，可以看到摆在人类面前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世界本原、思维与存在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一个是究天人之际的问题。前者源于人类蒙昧时代的愚昧和认识的不足，关注的中心是人的认识与其对象的关系；后者直接从历史和生活经验提出，关注的中心是社会人事与外界世界的关系。这是两个相互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无法回避的。可以说，它们是人类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发展自己必然要面对的两个基本问题；或者说，它们是人类与人之外的世界（或对象）的关系这个总问题的两个部分、两个方面。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分别突出了其中的一个，由此而形成中西哲学的不同。如果说西方哲学是爱智之学的话，中国哲学则是证道之学。由此也就带来东西文化的一系列特点。比如西方重科学，讲征服自然，讲“知识就是力量”，中国重道德，讲赞天地之化育，讲修身为本；西方发展了科学，中国发展了人文精神，等等。从中西文化的差异这个角度上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补就有着更为深刻和广泛的意义。

以上所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总体上的互补性。就局部的具体的问题来说，不同学说的思想体系不同，在各个问题上的观点也有不同，但他们探讨的问题许多是相同的，具体问题上的思想观点也往往有某种互补性。这种互补性表现为不同的情形，或者是观点相通、相近而表述形式不同，可以互相参照；或是对某个问题的认识各自突出阐发了其某一个方面，可以互补不足；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一方面，需要对各个问题一个个地作具体的研究分析，这里且举二例。

（1）对立统一

对立统一是宇宙万物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内容；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丰富的辩证思想，中国哲学中的“两一”问题说的就是对立统一，二者是相通的。同时中国古代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又有不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强调“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中国古代辩证法则强调“和实生物”和“致中和”、“仇必和而解”。对立方面的斗争与和谐，是构成事物发展的两个方面；事物的发展总是既有斗争，又有和谐；两个方面各有其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中国古代辩证法各自强调了一个方面。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和谐、统一，但对和谐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恰恰是中国古代辩证法发挥了这一方面；中国古代辩证法也不是否定斗争，但对斗争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缺乏足够的重视，有某种忽视斗争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关于斗争绝对性的思想可以克服中国古代辩证法这方面的不足。综合二者之长，可以达到全面的认识。

当代学者张岱年早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综合创新，对于事物内部对立双方冲突与和谐这两个方面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张岱年肯定辩证唯物论关于矛盾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斗争绝对性的思想，对“仇必和而解”和《中庸》所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对立之两方，如一方胜过一方而容纳之，可谓和解；如一方胜过一方而消灭之，则非和解。和解亦暂时的。旧有矛盾和解，新生矛盾又起。如是不已。故宇宙变化无穷无息。”《中庸》所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实为不可能的”，“就实际言之，和谐是暂时的，冲突是经常的。”同时他对和谐的意义和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和谐是一切新事物生成的基础。他说：

凡物之毁灭，皆由于冲突；凡物之生成，皆由于相对的和谐。

如无冲突则旧物不灭，而物物归于静止。

如无和谐则新物不成，而一切止于破碎。

……

凡物之继续存在，皆在于其内外之冲突未能胜过其内部的和谐。如一物失其内在的和谐，必由于内部冲突而毁灭。

乖违为旧物破灭之由，和谐为新物生成之因。事物变化，一乖一和。

他又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改写为“万物并育，虽相害而不相灭；道并行，虽相悖而亦相成。”在《自述四十岁前为学要旨》中，他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概括为：“矛盾为变化之源，和谐为存在之基。”综合了两种辩证法思想的合理成分，对斗争与和谐的关系问题做出了较全面的回答。

无疑，全面认识斗争和和谐的关系及他们各自在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对于实践有着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关闭窗口\]](#)